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宣传研究

——基于《红色中华》特刊

康 愷, 杜 鹏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芜湖 241002)

摘要: 中国共产党历来保持纪念重大事件与重大节日的传统。在中央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借助《红色中华》特刊, 对十月革命、“二七”大罢工、五卅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 “三八”节、“五一”节等重大节日, 以及自身办刊历史进行纪念报道。《红色中华》特刊的纪念宣传叙事呈现题材丰富、主题鲜明、贴近群众的特色, 既彰显了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信仰, 也展现出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革命理想和目标。从历史意义来看,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宣传, 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 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面形象, 广泛动员了苏区人民投身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红色中华》特刊; 纪念报道; 宣传; 动员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10-0569-09

Research on the commemoration and publicit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Taking the special issue of *Red China* as an example

KANG Kai, DU Pe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had a tradition of commemorating significant events and holiday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entral Soviet Reg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tilized the special issue of *Red China* to commemorate and report on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such a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e February 7th Incident, the May 30th Movement, as well as significant holidays like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and May Day, along with the history of its own publications. The commemorative narrative in the special issue of *Red China* showcases rich topics, clear themes, and a close connection to the people, highlighting the belief in Marxism-Leninism and the revolutionary ideals and objectives of opposing imperialism and the rule of the reactionary Kuominta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nd propaganda effort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effectively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of popularizing Marxism, shaped the just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mobilized the Soviet area popula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olitical power.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pecial issue of *Red China*; commemorative report; propaganda; mobilization

193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启了局部执政的政治实践。这一时期,《红色中华》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高、影响力最强的报纸。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相对封闭的根据地条件下,党充分利用纪念特刊报道的政治仪式与宣传媒介双重功能开展革命宣传动员,以形塑集体记忆、强化群众政治认同。

“人们认知历史,首先必须把实际发生过的历史‘想象’为一种可表征的形式,然后才有可能追问这种历史是什么。”^[1]纪念宣传作为中共党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了历史“想象”的表征功能,通过独特方式开辟了党史研究新路径。陈金龙^[2]、李军全^[3]等围绕中共纪念史研究样态与范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创办的《红色中华》围绕“二七”大罢工、十月革命、“五一”节等重大事件与节日,在8期文章中特设纪念版块,成为研究中共纪念宣传的珍贵史料。虽学界对《红色中华》的研究成果丰硕,如张莉卓等^[4]、苏洁等^[5]、李红等^[6]以《红色中华》为文本,探讨中央苏区时期文化教育、妇女解放、“扩红运动”等议题,但均未关注其特刊的纪念叙事部分。因此,研究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宣传,深刻分析《红色中华》中关于革命历史事件和重要节日的纪念报道,分析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念活动的形式、内容及历史意义,既能深挖该报的史料价值,也有助于完善中共纪念宣传研究。

一、《红色中华》纪念特刊报道的主要内容

《红色中华》从1931年12月11日创刊至1934年10月停刊,共出版240期,其中8期以“纪念特刊”为题,内容兼具理论性和艺术性。这些特刊涵盖三大主题:以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纪念特刊,包括《“二七”增刊》《十月革命纪念专刊》《十月革命专号》以及《红中文艺副刊“五卅”纪念专号》;以重大节日为主题的纪念特刊,包括《“三八”特刊》《红中文艺副刊“五一”纪念专号》《“三八”纪念特刊》;以《红色中华》自身办刊历史为主题的纪念特刊,包括《本报一周年广暴五周年宁暴一周年纪念特刊》以及《红中三百期特刊》。

(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报道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红色中华》对“十月革命”“二七”大罢工、广州起义及宁都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纪念报道,以强化历史叙事的方

式巩固执政合法性,凝聚苏区群众思想共识,保障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战争环境下的建设推进。

一是《红色中华》关于十月革命的纪念特刊报道。十月革命是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所完成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中共对十月革命的纪念报道,既是意识形态塑造和政治动员的手段,也是革命经验汲取和国际战略的体现,服务于当时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1932年至1934年,《红色中华》刊登涉及十月革命的纪念文章达47篇。1932年11月7日《红色中华》第39期首次以十月革命为纪念主题,刊载了一系列的宣告书、报告书及贺电。如,《中国共产党共产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告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战士书》一文既展现对苏联建设成就的推崇,又将苏联形象与苏区反“围剿”斗争结合,实现了十月革命历史符号与苏区革命现实的有机衔接。第121期刊载的《十月革命纪念与社会主义的胜利》《我歌颂五年计划》《十月革命暴动纪略》等文章,通过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在工业、农业、技术和文化领域发展的盛况,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弊端,为苏区建设提供“社会主义样板”。同期刊载的《为布尔什维克的战争动员而斗争》《十月革命暴动纪略》等文章,中国共产党借助《红色中华》直接号召广大苏区军民投身革命,有效推动了革命实践。

二是《红色中华》出版的“二七”大罢工纪念特刊。1923年2月7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在吴佩孚的命令下屠杀工会代表及工人纠察队,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为唤醒民众,使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民族及阶级的敌人,项英在1932年2月3日《红色中华》“二七”增刊中发表的《“二七”事略》一文,以惨烈场景细节唤醒民众,激发阶级仇恨,指出“‘二七’伟大的英勇斗争,是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发展道路”^{[7]120}。周恩来也在同期发表《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明确指出“闽赣两苏区工人代表大会在‘二七’开幕”,时间上选择惨案九周年节点,空间上则关联闽赣苏区工人代表大会,形成了历史创伤与现实斗争的时空对应,同时创新性地将纪念仪式转化为政治实践,阐述了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7]121}。这种将历史记忆与革命任务紧密结合的宣传策略,是纪念特刊区别于其他宣传形式的显著特征。

三是关于广州起义和宁都起义的纪念特刊报道。1932年《红色中华》第44期作为纪念广州起义五周年及宁都起义一周年的特刊,刊载了1篇社论、

2篇地方军政机构向中央的致电与通电,以及4篇总结武装暴动经验的文章。其中首篇社论《今年纪念广州暴动与宁都兵暴的任务》明确提出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并且强调要把宁都起义的经验总结起来指导武装斗争,“我们要在艰苦的工作中把宁都兵暴扩大出去,就要有抚州兵暴、吉安兵暴、赣州兵暴、南昌兵暴、漳厦兵暴……”强调这是每个革命者的任务,要把握一切机会宣传革命的思想,最终目的是“组织白军的士兵群众,举行兵暴,兵变,拖枪到红军来”^{[7]833}。特别是邓发撰文《纪念广州暴动学习广州暴动经验和教训》,深入剖析了广州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从两个关键维度进行了分析:首先,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仍处于相对稳固时期,中国革命面临的外部环境严峻;其次,中国革命因缺乏国际力量的有效支持,正经历暂时的挫折期。邓发的分析突破了单纯的国内视角,将中国革命置于世界革命的宏大背景下进行考量,建立起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内在联系,展现了更为宏观和系统的历史认识。邓发还强调“广州暴动是有很光荣伟大革命意义的”^{[7]834},要吸取广州暴动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不断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政治军事训练,发动广大工农投身阶级斗争和革命。这种将本土革命与世界革命关联、以历史经验指导现实斗争的叙事方式,凸显了特刊作为政党知识传播载体的实践价值。

四是纪念“五卅运动”的“红中文艺副刊‘五卅’纪念专号”。文艺性副刊《赤焰》创刊于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第72期。随后,第82期《赤焰》刊发了“五卅”纪念专号,集中展示了一系列文艺作品,包括诗歌《八年间》、活报《“抗日”喜剧》以及小说《兄弟不打兄弟》等。这些作品以强烈的艺术表现力和政治诉求,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坚定立场与决心。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讽刺与批判,进一步揭露了其在民族危机中的妥协姿态。如短诗《八年间》描绘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者的血腥屠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华北的残酷殖民统治,指出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高举“反帝国主义的苏维埃红旗”^{[7]1510}。这种文艺化叙事打破理论宣传的抽象局限,以情感共鸣强化动员效果,凸显纪念特刊的独特价值。

(二)重大节日的纪念报道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视“五一”节和“三八”节这两个国际性节日,《红色中华》的纪念文章数量便是明证。经统计,该报围绕“五一”节出

版1期纪念特刊,刊载83篇纪念文章;以“三八”节为主题推出2期特刊,刊发32篇相关文章。

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创新推出文艺副刊“赤焰”,创刊号紧扣“五一”节开展纪念报道。首期刊载的诗歌《到处是赤焰》以燎原之势的赤焰,生动描绘中国革命如火如荼的场景,借“赤焰”这一象征光明与生命力的意象,提振苏区军民的革命信心:“这将要燃着每个劳动者的心窝,革命的热情,斗争的决心,和潮水般澎湃汹涌,像钢铁一样坚韧”^{[7]1302},尽显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与必胜信念。通过《红色中华》的纪念报道,“五一”节的现实活动与文本纪念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挥了文艺的鼓动效能。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于1933年3月3日和1934年3月8日出版两期“三八”节纪念特刊。其中1933年特刊仅两个版面,刊载了时英的现代诗《纪念“三八”》、月林的《欢送红军战士去前方》、沙可夫的活报《“三八”纪念》、然之的自述文《苏联新女性》,第二版还刊登了一组三幅宣传画。沙可夫撰写的活报《“三八”纪念》以舞台剧台词形式,在开篇第一节直指“被压迫的妇女!革命是唯一出路”^{[7]1047},旁白中又强调“三八”节是国际劳动妇女节,号召受压迫妇女配合苏区紧急的“扩红”任务参与劳动生产,为经济、社会及自身解放而斗争。

1934年“三八”节,《红色中华》虽未单独出专刊,却在3月8日第159期5、6版推出纪念报道,延续了制作特刊的高水准。内容涵盖《瑞金“三八”节工作的初步检查》《瑞金妇女在扩红突击运动中的光荣成绩》2篇工作报告、《苏维埃女工的话》《红军家属三八节寄出》2篇苏区妇女自述,还有两首歌曲《山歌》《托儿曲》、1篇论文《“三八”妇女节的国际意义》、1篇法庭裁决报道《苏维埃保障妇女权利》、1篇演出预告《苏维埃剧团“三八”的解放》以及3幅插画。其中,见珍撰写的报告既表扬瑞金妇女在“三八”突击运动中做草鞋、节省经济、发展女党团员的成绩,也总结分享下肖区通过反妇女官僚主义推动工作的经验,生动展现了苏区妇女参军支前的风采。

(三)办刊历史的纪念报道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除通过《红色中华》出版重要活动纪念特刊外,还以办刊周年或百期纪念为主题出版内容,借此构建历史记忆并强化该刊的宣传鼓动功能。

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在广州起义纪念日创刊。次年同日,红色中华通讯社于广州起义

五周年暨《红色中华》创刊一周年之际,出版纪念特刊。特刊中,红色中华编辑室发表《本报一周年的自我批评》,指出办刊撰稿不足,呼吁苏区工农群众提意见,计划开设“读者通信”栏目,以便充分刊登工农群众的反馈。同时为了强化《红色中华》在全国苏区的舆论宣传作用,“我们诚恳地希望全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一致地以‘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的精神,来爱护《红色中华》,尤其是在质量上的推运,和数量上的推销。”^{[7]838} 文章还展望了《红色中华》的发展前景,充满自信地表示,希望在《红色中华》二周年纪念时便能以“日报”形式与全国苏区工农劳苦群众读者相见。同期斗人发表的《献给一周岁的〈红色中华〉》,旗帜鲜明地指出“它是工农苏维埃政权的产儿,它在广州公社四周年纪念的那天印出第一期”^{[7]843},同时呼吁“把所有的意见贡献出来吧,即使我们的意见还不正确,不充分”^{[7]845}。这2篇文章反映出红色中华通讯社对改进报刊的殷切希望。此外,借周年纪念,红色中华通讯社强化广州起义、宁都起义的历史意义,提升刊物传播力;中国共产党刊载《宁暴纪念日临时中央政府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电》,表彰第五军团的光荣、英勇,激励广大苏区军民为保卫革命政权而继续斗争。

二、《红色中华》纪念特刊报道的特点

在纪念性报道实践中,《红色中华》形成政治性、人民性、创新性三位一体的特色。其纪念特刊以鼓动性标题、标语口号开展宣传,立足人民立场,从工人、妇女、士兵等群体视角切入,激发群众革命热情。同时,借助剧本、诗歌、漫画等通俗文化艺术形式,拉近党群距离,构建起世界视野本土化表达、官方话语大众化传播、历史记忆现实性动员的多维传播体系,开创了中央苏区党报特刊的独特宣传范式。

(一)宣传题材丰富,形式多样

《红色中华》纪念特刊内容丰富,覆盖政治、经济、文化、战争等多领域。为契合苏区群众文化程度,增强传播效果,特刊创新采用剧本、诗歌、漫画等文艺形式,突破传统党报党刊以严肃政治文章为主的局限,开创了政治宣传艺术化、大众化表达的新路径。

其一,《红色中华》纪念特刊题材选取十分丰富,呈现鲜明的世界视野与本土关怀并重的特征。其报道内容不仅涵盖国内工人、妇女、士兵等群体的革命事迹,更有意识地引入苏联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典型人物与事件作为报道素材。比如1934年3

月8日《红色中华》“三八”节特刊刊载了苏区妇女刘长凤撰写的自述《苏维埃女工的话》,通过个人命运变迁印证革命成效,实现了政治宣传的生活化转化。还有然之撰写的《几个女英雄的自述》,通过卞雅、柯米沙洛华、鲁尼娜、费陀诺华、费勃林娜五位苏联女性的奋斗故事,展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真实图景。以费陀诺华女英雄的自述为例,“在节省浪费上,改良工作方法上,超过生产计划上,以及社会工作上,我们都得到了许多成功,全队都受领列宁勋章。自从得到勋章后,我们每人更知道自勉了!”^{[7]1049} 她讲述了自己不在乎他人的眼光,毅然组织生产突击队投入紧张的劳动当中,并获得列宁勋章的光辉事迹,以个体奋斗故事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形成了榜样示范下产生情感共鸣,进而推动行动激励的传播链条。《红色中华》纪念特刊以苏联妇女的觉醒、解放、奋斗为题材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塑造了社会主义国家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义形象,并且动员广大受压迫的妇女学习她们的斗争精神,努力挣脱束缚,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获得胜利。这种宣传报道方式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的认同与呼应,又保持了立足本土的革命叙事,展现了当时革命宣传工作的多维面向。

其二,《红色中华》纪念特刊报道形式多样,既有传统的社论、报告书、贺电等中国共产党权威性官方新闻报道,也有创新性报道形式如现代诗、话剧本、韵文、漫画、曲谱、活报、小说等苏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传统报道形式如《十月革命纪念专刊》。1932年11月7日《红色中华》出版《十月革命纪念专刊》,登载了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周年纪念宣言、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书,以及各个党政军机关关于十月革命的纪念通电等方面的文章,从国际国内革命形势、阶级力量对比,到苏维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建设成效,全方位、多角度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其中,《工农红军江西军区总指挥部及政治部贺电》一文热烈庆贺党和苏维埃政府一年以来领导苏区军民取得的革命成果,表达了对夺取江西及邻省革命的首先胜利,并最终实现全国革命运动完全胜利的信心。这些社论、宣言和通电等官方文本,进一步巩固了苏区军民的政治认同,强化了革命信念。

创新报道形式首推“红中文艺副刊‘五一’纪念专号”。1933年4月23日出版的该期专号首创诗

歌、戏剧、插图等七种文艺形式并置的呈现方式,充分展现了革命文艺的宣传动员价值。其中歌曲《“五一”斗争曲》、戏剧《我们自己的事》等作品,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革命斗争主题,将政治诉求转化为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达,让革命理念通过群众熟悉的文化载体深入人心。此后,《红色中华》陆续推出了“五卅”纪念专号(第82期)和“八一”纪念专号(第98期),进一步拓展了革命文艺的实践领域。这些专号中发表的诗歌《八年间》《我们的斗争日》《回南昌》,活报《“抗日”喜剧》,以及小说《兄弟不打兄弟》等文艺作品,以多种多样的纪念报道形式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镇压及帝国主义侵略的立场与决心,传达、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府领导苏区军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外敌、夺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性,具有鲜明的思想性、斗争性和感染力。

(二)宣传主题突出,目标鲜明

中央苏区时期,《红色中华》的纪念特刊报道始终以党在革命时期的现实任务为核心,注重价值传递,遵循从历史诠释出发、落脚于革命现实的宣传逻辑。党和苏维埃政府通过特刊报道,系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国内形势及共产主义理想等内容,这些宣传既深刻契合苏区群众的根本愿望与现实需求,也展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态度,使纪念特刊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现实斗争的重要舆论阵地。

通过纪念特刊报道,中国共产党将现阶段革命形势、目标以及斗争方式等内容精准传递给广大苏区军民。如1932年3月2日“‘二七’增刊”刊载了周恩来撰写的《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旗帜鲜明地提出:“全中国群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政府。”^{[7]121}这一号召不仅明确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的坚定立场,更深刻阐释了人民战争思想,将历史纪念转化为革命动员,有力号召最广大人民群众凝聚反抗力量。再如1932年12月11日刊载了吴亮平撰写的《马克思列宁论兵暴》,该文通过理论阐释,以广州暴动五周年纪念为契机,将暴动经验转化为实践指导,赞颂广州暴动在世界革命史上具有“非常伟大的意义”^{[7]836},分析失败原因时从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等层面总结教训,呼吁革命者深入学习马列关于暴动的理论。同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专刊刊载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周年纪念宣言》《中国共产党共产青

年团苏区中央局告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战士书》等文章,详细描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苏维埃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改善了苏区工人、农民的生活,“在苏维埃的法令保障下,工人得到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农民获得土地,废除了国民党军阀的一切苛捐杂税”^{[7]714}。以中国共产党改善苏区群众生活之正面塑造,加以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治的压迫本质之反面揭露,构建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框架。《红色中华》借纪念特刊宣传革命思想,持续鼓舞军民以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推动革命实践发展。

《红色中华》纪念特刊中刊载的内容均带有强烈的阶级色彩,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强调革命的正义性,让民众了解革命斗争目的是创造共产主义理想社会。

(三)宣传贴近人民,鼓动性强

《红色中华》纪念特刊在受众传播策略上展现出鲜明的“三贴近”特征,即贴近群众认知水平、贴近生活实际、贴近情感需求。其通过系统化宣传策略,成功突破了苏区群众文化程度有限的传播障碍,扭转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新兴政权认知不足的局面,适应了红军战士和工农群众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状况,有效整合了苏区社会各方力量。

首先,《红色中华》纪念特刊在传播策略上“贴近群众”,以简短醒目的标题和通俗生动的语言提升宣传效能。如1933年3月3日出版的《“三八”特刊》中,《纪念“三八”》《欢送红色战士去前方》等文章以简短直白的标题清晰传递纪念活动意图,迅速抓住苏区妇女读者目光,强化革命鼓动效果。同时,特刊注重把党和政府提出的政治任务、思想理论,化为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来满足苏区受众,如将参军支前的政治任务实现政治话语的民间转译,化为报道中“共同来做革命事,夫妻相爱正之长!”“父母妻子你莫管,一心革命正应该!”^{[7]1046}的口号,并以平均8字以内的短歌形式传播。这些通俗易懂的语言改造,既契合苏区群众文化水平,又以生活化口吻激发妇女支援前线的热情,显著提升了信息传播效率与受众接受度。

其次,纪念特刊常借助漫画的直观性降低宣传理解门槛,以通俗化、大众化策略消解苏区群众文化程度较低带来的传播阻力。如1933年4月23日《“五一”纪念专号》刊登的漫画《所失却的只是锁链》,以简洁的笔触刻画赤裸上身的工人奋力挣脱木枷镣铐的形象,通过视觉语言传递“工人阶级失去的只是枷锁”的革命理念,鼓舞其通过斗争实现解放;

同期《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画中描绘了一群站在微型地球之上手持镰刀、铁锤和党旗的工农共同振臂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7]1306}，以“团结改变世界”的视觉隐喻，强化无产阶级联合的力量感。这些漫画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极简的构图线条，使苏区群众直观理解阶级压迫本质与革命团结的必要性，图像符号的传播效率较纯文字显著提升，成为党和苏维埃政府革命动员的有力工具。

再次，《红色中华》纪念特刊围绕群众切身利益进行报道，并通过描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下工农生活的变化，引发苏区群众的情感共鸣。如1934年3月8日“三八”节特刊刊载了兴国高兴区上村乡妇女刘长凤撰写的自述《苏维埃女工的话》，文中提到在土地革命以前“女人是被压迫的，我家里又穷苦”，而土地革命之后“家里分了田地，还得到很多自由”^{[7]2895}。作者以党领导土地革命后自身在土地分配、人身自由、文化教育及政治权利等方面的真实转变，强化群众对革命正当性的认知，号召苏区妇女投身革命、支援前线。再比如1933年3月3日刊载的《苏联的新女性》一文中提到“柯米沙洛华，约莫(约摸)五十岁的女人，叙述她艰苦的革命故事……我们的生活一年好似一年”^{[7]1048}，作者然之描绘了一位苏联妇女在革命战争失败后坚持斗争，革命胜利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经历。《红色中华》纪念特刊通过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细致展现工农在生活、教育、工作等方面的转变，让苏区群众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心中的地位，极大鼓舞了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创造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信心。

三、《红色中华》纪念特刊报道的历史意义

“纪念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程序定格和放大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影响人们的情感和行为，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文化活动。”^[8]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重要历史事件、重大节日为契机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同时借助《红色中华》这一党报党刊的特殊地位刊载纪念特刊，将纪念活动的影响从苏区扩展至全国各个苏区乃至苏区以外的普通民众，进一步深化了纪念意义。

(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借助《红色中华》围绕纪念活动展开的报道实践，构建了早期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命题的重要探索。这一时期，党通过《红色中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行纪念性报道，宣传其生平、理

论及革命贡献，有效缩短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与苏区民众的心理距离，搭建起工农群众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沟通桥梁。纪念特刊发行常配合群众集会，既唤起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信仰热情，也为其传播奠定思想基础。同时，党以纪念特刊报道为契机，培养了大批深入苏区基层宣传教育领域的骨干，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翻译、印刷与广泛传播。此外，通过对十月革命、“五一”节等重大历史事件和节日的纪念报道，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为其大众化和本土化注入持续动力。

习近平指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9]以《红色中华》关于十月革命的纪念特刊为例，十月革命作为一种“境外”纪念资源，与其他本土资源相比更具特殊性。如何将这一国际事件从“中国化”再到“大众化”，使普通民众理解并接受，成为纪念报道工作的关键挑战。为预热“本报一周年广暴五周年宁暴一周年”纪念特刊，《红色中华》提前数周便在第38—40期日常发行报刊的版面末尾皆特意附上一则《编辑部启事》，其中强调“我们决定出一周年纪念号，希望读者同志踊跃投稿，本报当尽量登载，务希于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寄到”^{[7]712}，强调纪念特刊重要性并号召读者投稿，既凸显时间节点意义，又提升军民阅报积极性。

特刊刊载的《马克思列宁论武装暴动》深入对比中国对立政权下民众生活，揭示本质差异与发展趋势，同时总结列宁关于十月革命成功的基本法则，赋予纪念以新的时代内涵，既保持理论与与时俱进的品格，又增强革命主张的现实说服力。与一般纪念报道和日常报道相比，纪念特刊围绕重大事件、节日或政治主题，内容更具深度与系统性，政治教育和宣传功能鲜明——后者侧重即时性与新闻性，缺乏对内容的系统分析。

在纪念特刊中，中国共产党向苏区民众传播苏联革命学说，将中国革命定位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比教育使群众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制度，为革命实践奠定思想基础。这一过程既阐明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又赋予其本土化阐释，实现理论传播与实践指导的统一。对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而言，革命动员是纪念十月革命的核心。每逢重大节日，中国共产党借特刊头版头条刊载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文章，指导纪念大会、“扩红”运动等群众性活动开展。活动盛况通过新闻报道、

评论,结合领袖画像、宣传标语、口号等视觉与听觉元素,营造马克思主义传播场景,使抽象理论具体可感,推动其深入群众。随着苏维埃政权建设推进,苏区民众对新政权的信任转化为对“苏联”“马克思”“列宁”等符号的情感认同。纪念特刊报道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现实路径,拓宽传播途径并推动其在实践中深入发展。

(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正面形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组织迈向政权建设的关键节点。在此时期,通过塑造良好政权形象以争取国内外力量的理解支持至关重要,而纪念特刊报道则成为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义形象的重要阵地与对外窗口。《红色中华》的纪念特刊报道,成为中国共产党传递政治理想、阐释政策主张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些报道,党不仅为群众指明革命斗争方向,更有力塑造了苏维埃政府的正义形象。报道将苏联定位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引领者,把中国苏维埃运动与革命斗争诠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土实践,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凝聚和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受压迫群众的精神旗帜。

在纪念特刊中,中国共产党对苏联十月革命、广州起义、宁都起义等历史事件展开深入报道,将土地革命纳入苏联领导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这一策略双管齐下:既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污蔑抹黑,又紧密联结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为中国革命赢得更多正当性与社会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红色中华》虽未以特刊、专刊报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问题,但“九一八”事变后,该刊迅速披露了日军侵占中国东北的暴行。此后每期纪念特刊均刊发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以东北民众遭受的压迫与屠杀为证,直接揭露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为对日本侵略的纵容、对抗日力量的削弱。报道将日本侵华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强调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和支持,塑造“中苏联合反帝”的叙事。同时,中国共产党极大发挥《红色中华》的舆论引导作用,打造了关注民生的苏维埃政府形象。比如在“三八”节、“五一”节等重要节日纪念特刊报道中,通过宣传维护工人、妇女权益的执政理念,生动展现党关心民生、捍卫人民利益的担当,进一步夯实苏维埃政府的良好形象基础。碧山在《“三八”妇女节的国际意义》中指出“三月八日是国际劳动妇女团结起来努

力解放斗争的纪念节”,并且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已经实现了妇女解放,“中国现在已经有几千万劳动妇女参加了苏维埃革命,要到了解放和自由”^{[7]2894}。纪念特刊通过刻画广大拥苏爱党的民众群像,有效激发民众投身苏维埃运动的热情,进一步拉近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距离,生动诠释苏区党政军民团结一心的深厚情谊。正如记载所示:“这次我东方作战军开往福建作战,沿途群众莫不欢欣鼓舞,自动地烧茶水摆稀饭,请红军战士吃喝,热烈地排队伍喊口号,向红军战士敬礼,祝红军大逞威风,消灭东方战线的敌人。”^{[7]1759}相较于日常定期报道,纪念特刊以更强烈、更集中的表现力,凸显重要历史时刻的宣传动员作用。

(三)动员了广大军民保卫和建设苏区

中国共产党通过《红色中华》的纪念特刊报道,将重要节日的政治意义与群众的日常生活、革命需求紧密结合,实现了广泛的动员与教育功能,为苏区保卫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纪念活动并非对历史的简单回溯,而是服务于当下革命斗争,使纪念宣传成为连接政治目标与群众实践的即时桥梁,在整合苏区社会力量、强化革命认同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闻天在《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一文中指出:“只要我们能够活泼的(地)利用每一具体的事变,利用公开的可能去开展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我们的活动范围,一定可以十倍的百倍的(地)扩大。”^[10]这一论述从革命实践角度,揭示了纪念性活动在政治动员中的特殊功能。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节日的纪念性宣传,既能强化群众的革命记忆,又为党提供了政治动员契机,有效扩大了党的革命影响力。以“五一”节纪念特刊报道为例,面对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五一”节纪念的中心任务便是政治动员。1933年3月25日中央下发的“红五月”工作决议,从权威层面强调宣传与组织工作,赋予了纪念特刊特殊的宣传地位与政治使命。在宣传方面,“责成中央党报委员会须于四月廿日刊行‘红五月特刊’,各级党刊亦需发行特刊”^[11],广泛印发工厂小报、传单标语,迅速传达中央口号,组织宣传队分区开展活动,利用工厂、学校、学术团体等各类团体在纪念日举办辩论会、演讲会等;在组织方面,各地工厂成立群众性红五月筹备委员会,同时成立专门领导机构筹划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并将其作为“红五月”运动的核心成果。这种宣传动员成效显著,仅汀州一地“‘五一’劳动节,下午二时于列宁

公园开示威大会,计到会群众五千余人……加入共产党的十六人,加入团的二十余人”^{[7]1420}。通过系统化的宣传覆盖与群众性组织动员相结合,最终实现政治影响力的最大化,形成“文本—仪式—行动”的闭环动员。

《红色中华》纪念特刊还将国内革命形势、国际帝国主义战争态势与党的政治主张结合宣扬,号召人们加入革命队伍。沙可夫发表的《我们自己的事》揭露国民党官僚与帝国主义勾结压迫劳苦大众的罪行,号召群众投身革命斗争;《一个乡扩大一连!纪念“八一”迅速完成工人师!》则展现博生县群众加入红军的盛况,“博生县固村区老禾乡模范连连长指导员领导了全连战斗员八十三名在军人大会上—致通过加入红军,六月二十七日已集中县军事部转送工人师。”^{[7]1759}在纪念特刊的宣传鼓动下,苏区工农群众自发参与保卫苏区的革命热潮可见一斑。

中央苏区地处赣南、闽西山区,自然条件贫瘠,又长期面临敌人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经济建设压力空前。在此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借助“五一”“三八”节纪念特刊,肯定劳动者在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大力弘扬劳动光荣的理念。这些特刊有效激发了苏区群众的生产与革命热情。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刊载的《“五一”斗争曲》中就号召工人要“用自己的手创造的世界”^{[7]1303},强调生产劳动服务于工农自身幸福与革命战争需要,显著提升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1933年3月3日《红色中华》出版的“三八”节特刊中刊载的《纪念“三八”》,指出妇女既可像红军兄弟一样全副武装开赴前线,也可在后方配合进行耕种、备粮、制鞋等生产劳动。中国共产党以“三八”纪念特刊报道活动为契机,将报道视角关注到苏区生产潜力巨大的妇女群体上,赞誉妇女是“新时代的斗士,个个都像那健美的大树!”^{[7]1045}通过思想动员提升妇女社会地位,激发其劳动热情。此外,特刊还介绍苏联妇女在革命与政治活动中的成就,“苏联广大的千百万工农妇女,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英雄的传奇。”^{[7]1048}此类报道拓宽了苏区妇女的视野,树立了她们自我成长的榜样,进而激发她们革命和建设的热情。

四、结 语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红色中华》为宣传主阵地,通过刊载纪念文章、革命诗歌与红色漫画等多元形式,系统回溯重大历史事件,结合革命时局

提炼其经验价值。从马克思、列宁诞辰,到宁都起义和“九一八”事变,每期纪念特刊均紧扣特定历史节点,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针对性。这些报道持续强化苏区军民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推动集体记忆的形成,为苏区建设注入思想动力。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叙事中,将革命斗争与军民命运紧密交织,借由年度纪念报道深化群体认同,逐步将分散的历史意识升华为更高层次、更宏大叙事的国家记忆。这一过程不仅为革命事业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更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长远发展筑牢了历史根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秉承追忆历史与缅怀革命先烈的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华社建社85周年的贺信中指出:“新华社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跟党走,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and 舆论导向,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12]《红色中华》纪念特刊的成功,在于其将历史事件转化为革命动员的宣传方式,为新时代纪念宣传提供了重要启示。新时代纪念宣传需在传承这一逻辑的基础上守正创新,作为关键宣传手段,可从四方面发力:首先,坚持党对宣传阵地的领导,通过报刊等主流媒体构建系统化的历史宣传体系,以政治仪式强化集体记忆。严格把控重大历史事件和节日的报道框架,将革命符号与当代政治话语有机融合,通过社论、专题报道等形式确立权威解读。其次,注重历史逻辑与现实政治的辩证统一。推动纪念宣传既传承革命记忆,又服务于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需求,如从革命符号到复兴符号的迭代升级,转变叙事风格为自豪感与危机感并重,在坚守反帝、人民民主等核心价值的同时,将历史事件与民族复兴、科技自强、民生福祉等当代议题符号化联结,构建历史与现实的叙事闭环。再次,革新融媒体传播方式,推动宣传从单向灌输转向参与式记忆构建。突破传统媒体边界,善用新媒体技术与AI手段,提升历史呈现的感染力,借助虚拟现实体验、游戏化互动等沉浸式传播策略,增强年轻群体的历史共鸣,提升纪念活动的传播效能与可信度。最后,拓展国际传播维度,跳出革命话语局限,将纪念叙事升华为人类共同价值表达。以反法西斯、和平发展等全球性议题为纽带,建立跨文化认同,实现从政治动员到社会共识重塑的范式转变。通过以上路径,党的纪念宣传将成为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桥梁,助力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大众化传播。

《红色中华》纪念特刊作为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政治仪式媒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选择

性强化以及革命斗争话语的动态调适,实现了从信息传播到意义生产的升级。展望未来,中共革命报刊研究可能进一步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实践,着重关注媒介技术、空间传播与受众反应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在跨区域比较中探索革命宣传叙事的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 [1] 郭若平. 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理省思[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22(2): 14-24.
- [2] 陈金龙. 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20.
- [3] 李军全. 习近平纪念讲话与中共纪念史研究的进阶[J]. 中共党史研究, 2023(6): 38-45.
- [4] 张莉卓, 刘岳麓. 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宣传特色与启示: 基于《红色中华》的考察[J]. 传媒, 2024(12): 82-84.
- [5] 苏洁, 王菲. 中国共产党红色报刊塑造革命精神的符号学解读[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3): 34-38.
- [6] 李红, 万琼华. 苏区时期《红色中华》报对妇女解放话语的建构及启示[C]//2024年“中国式现代化与妇女发展: 理论与实践”论文集.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 291-300.
- [7]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中央档案馆. 《红色中华》全编: 整理本[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
- [8] 童小彪. 中国共产党纪念文化研究[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9: 56.
- [9]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05-05(02).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 第九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604.
- [11]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9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169.
- [12]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247.

(责任编辑: 陈婧)